



总主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三晋石刻大全



忻州市宁武县卷

主编

任宁虎
郭宝厚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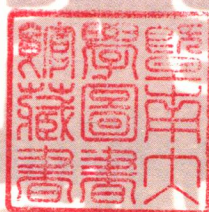
K877.402
20112
5



总 主 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三晋石刻大全

忻州市宁武县卷



主 编

任宁虎
郭宝厚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晋石刻大全. 忻州市宁武县卷 / 刘泽民, 李玉明总主编;
任宁虎, 郭宝厚分册主编.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457-0179-1

I. 三… II. ①刘…②李…③任…④郭… III. 石刻 - 宁武
县 - 图录 IV. K877.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6037号

三晋石刻大全·忻州市宁武县卷

总 主 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本卷主编: 任宁虎 郭宝厚

责任编辑: 任如花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8

印 张: 45.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 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179-1

定 价: 280.00元

ISBN 978-7-5457-0179-1



9 787545 701791 >

封扉题签：姚奠中



《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委员会

顾问：薛延忠 申维辰 申联彬 高建民 胡苏平
张 平 李立功 王庭栋 白清才 郭裕怀
李学勤 姚奠中 张正明 刘 江 张 颌

主任：刘泽民
常务主任：李玉明

副主任：罗广德 李茂盛 张国祥 刘在文 田中仁
雷忠勤 柴泽俊 刘纬毅 降大任 郭士星
赵望进 杨子荣 储仲君 郭双威 梁俊明
赵华山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敏政 石金鸣 史耀清 刘光彦 齐荣晋
张鸿仁 吴广隆 李 尧 李 非 李小强
陈长禄 高 可 崔正森 董占锁 董瑞山
潘孝忠 霍润德

总主编：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李玉明

副主任：罗广德 李茂盛 杨子荣 张继红 落馥香

《三晋石刻大全》忻州市编纂指导组

组长：潘孝忠
副组长：路 强 田 雷
成员：石光胜 秦建新 郭银堂 李培林

《三晋石刻大全·忻州市宁武县卷》编委会

主任：任宁虎 郭宝厚

副主任：张建平 陈润明 李应成 马在岐 杜莹海
张玉柱 郑建国 薛军良 弓凤英 张 林
梁海宏 谭生旺

主编：任宁虎 郭宝厚

副主编：薛军良 弓凤英 梁海宏 谭生旺 董常保

委员：董树平 连林杰 郭俊杰 符宁乐

拓印编辑：符宁乐

撰稿：郭俊杰 连林杰

继承历史文明
弘扬先进文化

施联秀

二〇〇九年元月

传承文脉
繁荣事业

潘孝忠

二〇一九年八月

保护文化遗产
建设文化强县

任宁虎
2009年



凡 例

一、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范围:新中国成立前后凡在《三晋石刻总目》中存目并补充遗漏和新发现的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其中布施碑,根据历史、文化价值并有助于当地古代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原则,慎重选择收录。收录上下限:上限从本地最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为止。

二、以县(市、区)分卷,原则上每县(市、区)一卷,另有山西省博物院卷、五台山卷、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各一卷。

三、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

四、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盒”,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和墓志铭,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

五、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全卷一般分两部分,即现存石刻与佚失石刻。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

六、每篇内容一般包括石刻名称(全称)、简介、石刻录文(全文)、断句。元代(含元代)以上的石刻每通(件)配黑白照片或拓片若干张(全景和特写),明清以后石刻遴选重要者配拓片和照片。

七、凡涉及人物的石刻,在“简介”中首先介绍人物的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然后再简介石刻。

八、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九、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

十、真假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可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

十一、纪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历史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如唐贞观元年

(627)。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用民国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如中华民国16年(1927),也可写成“民国16年(1927)”。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

十二、表示体积、面积等尺寸的,用厘米。如长(或高)120、宽60、高80厘米,长、宽均不加“厘米”二字,用顿号间隔。又如高120、宽60厘米,高也不加“厘米”。

十三、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原为简化字的,仍用简化字,主要是为了保存史料的真实性。其余均使用规范汉字。

十四、每卷收录的石刻文字,只作标点,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错别字、异体字、通假字等,保持原貌,一般不作甄别。

十五、石刻文字漫漶、剥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漫漶、剥泐字数不清的,用“……”或括注“下阙”。

十六、索引按类编排,使本书既可按历史顺序检索,又可按类检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总 序

李玉明

石刻,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内容非经文者)、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石刻,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专指“碑”;广义的理解,包括碑、墓志、造像等各类刻石。

所谓“碑”,汉以前就有了,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而是立于宗庙、学校,用以观日影,记时刻、测方向的。古代礼仪规定,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就是立于墓前用于下葬,称为“窆石”。下棺时用以固定轘轳,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称之为“碑穿”,用以系绳下棺;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因此,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而是实用。

现代意义上的“碑”,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原来在西汉以前,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西汉开始以石代金,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这即是金石铭文的由来。

从西汉“碑”开始镌刻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均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碑头有圭首、圆首、平首、梯首、冠形首、螭首等。碑身以长方形为多,另有倒瓶形,六棱、八棱形,正方柱形,扁方形等。碑座有龟趺形,形状庄重,采用得最多。古人以龟为长久,常常以龟(实际称鼋)背碑。碑的内容有功德碑,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庙碑,种类繁多,记述庙的修建历史;墓碑,记载死者籍贯、世系、事迹及卒葬时间等。还有记事碑、纪念碑、文告碑、诗文碑等。

从现代广义上讲,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而在先秦时除“碑”以外,其他都不称碑,而称“刻石”。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小臣系卣》和一些石磬刻字。以后有秦石鼓文、秦始皇峰山、泰山、琅琊台刻石等。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刻石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石幢、造像碑等刻石,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起源于汉代,形制为长方形。而标准方形的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西现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封和寃、辛祥墓志;北齐裴良、庾狄回洛、娄叡墓志;东魏刘懿墓志等。

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在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在为社会主义政治、物质、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受到地方当局、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重视。例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五台佛光寺东大殿,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经幢,解决了该殿学术上的两大问题。一是根据经幢的记载,该殿始建于唐德宗大中十一年(857),不仅使该殿是唐代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使这座国宝级文物建筑有了准确的纪年,其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二是从这幢经幢的记载中得知,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即捐资人)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宁公遇”。由于施主的身份高,其建筑的级别也相应被提高。又例如,山西现存一万八千多处古建筑,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要么文献记载简单,多数只一句话,要么查不到任何记载。而这些建筑前前后后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主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解决,因而各座古建筑附属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证据。再例如,山西历史上的灾荒不断,元大德七年(1303)平阳、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清光绪三年(1877)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死亡百姓不计其数,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些灾荒,由于历史的原

因(如信息不畅),或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有意隐瞒,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甚至缺失无记载。而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使后人永志不忘。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战火,或被人为破坏,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已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除灾荒碑外,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三晋石刻是我省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人文资源。因此,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是功在千秋,荫及子孙的一件好事、善事。

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访求石刻是历代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们的终生爱好和追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1474)创始《山西通志》时,就收录了“金石”资料,现在能够作为代表的是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的《山右石刻丛编》。这套《丛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录北魏至元代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碑碣、墓志铭等石刻720通(件)。还有在此之前于光绪十八年(1892)官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单行本称《山右金石记》),杨笃(秋湄)主编,收录汉以来碑刻1550余通。《山西通志·金石记》与《山右石刻丛编》比较,前者“有则录之,存亡不计”,后者“存者收录,亡者不述”。

山西历史上最多时究竟有多少石刻,谁也说不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四属原都称州,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区。《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720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精品,同样应予以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部门、组织,以及个人爱好者在石刻的调查、保护、拓印、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星分散,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也没有一个专门访求石刻的机构,使这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其次,历史资料少而缺失,已出版问世的石刻著作,存量极少,不仅难求,而且收录不全。比如《山右石刻丛编》和《山西通志·金石记》均收录到元代,且遗漏不少,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未被采摭,造成历史的遗憾。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只收录山西唐以前碑石45通,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只收录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大量的补遗拾缺工作。第三,建国以来又新发现了大量的石刻,特别是新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志铭、摩崖题记、造像碑等,大大丰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资料。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志的出土、黄河沿岸等处汉以来漕运摩崖题记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发现,以及其他一大批新发现石刻的著录登记等,都是重要的石刻资料,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进一步访求和研究。第四,石刻文物的特点是不能再生性,毁一件即少一件。比如北周武帝二次灭法,山西的汉碑及三国两晋碑除郭泰碑外,全部被毁。郭泰碑后来也流失不存,造成了“山右无汉碑”的历史遗憾。当前仍存在盗窃和建设工程中人为破坏石刻文物的严重现象,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古老石刻随时都有流失和被毁的危险。因此,抢救保护石刻,将其全部著录在册,世代流传下去,是当务之急,是带有抢救和存史双重重要性质的宏大工程。

为了全面系统地开展三晋石刻的访求和研究工作,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即借鉴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需要,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这个重任。从1990年开始,即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的《总目》正式出版,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合计16046通。

在基本完成《三晋石刻总目》编辑出版的基础上,从2007年正式开始编辑《三晋石刻大全》。《大全》以《总目》为基础,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石刻,不论存佚,有文则存,全文抄录,并断句。同时,每篇加“简介”,附照片或拓片。基本上每县(市、区)1卷,省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1卷,再加记事总目录1卷,全省预计125卷。

分步编辑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将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是为序。

序

忻州市政府秘书长

邢保厚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一部《三晋石刻大全·忻州市宁武县卷》从另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了宁武的历史，让读者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看到了前贤古圣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丰功伟绩，饱览了历代仁人志士热爱家乡、共创大业的辉煌足迹……。仔细读来，清新隽永、耳目一新之感油然而生。

宁武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战略地位突出。史料载，上古为楼烦国属地，秦汉为楼烦县，北宋为宋辽边境，明为宁武关、山西镇、兵备道，统领外三关军务，清雍正三年设宁武府，为山西九府之一。

特殊的地理位置，频繁的历史变迁，积淀了宁武宏厚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文明进步的印记，见证了民族文化的繁衍发展。除正史记载外，多以碑文石刻为载体。但是，历史的烽烟也导致境内许多碑石文献的缺失。再者，境内碑石多为砂石质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的消磨，使得大量文献剥落无存，消失于历史长河中。抢救具有珍贵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碑石文献成为保护文物、促进当代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当务之急。

党的十七大将“重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值此全国人民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际，县委、县政府在全面建设生态宁武、绿色宁武、和谐宁武的同时，将文物保护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长抓不懈，取得了辉煌成就。经过文物管理部门的艰苦努力，即将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忻州市宁武县卷》就是其中的又一佳作巨著。

纵览全书，所收录的碑文石刻涵盖古今，资料翔实，全面系统，图文并茂。编撰过程中，体例科学，整理严谨，可谓一部宁武的小型历史文献。此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了解宁武人文历史和促进宁武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研究宁武历史提供了丰富、系统、可靠的资料，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宁武，开辟了一个新的窗口。

概述

郭俊杰 连林杰

宁武县于明成化四年(1468)设宁武关,为固定的军事基地。清雍正三年(1725)始设府、县,成为朝廷北方重镇。宁武县历史悠久,山岳秀丽,人文荟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国人有立碑刻石记功叙事的传统,在宁武悠久的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庙宇里碑刻林立,记录着香火的盛衰;官府布告及民间立约也都立碑刻石,以昭后世;达官贵人的墓碑比比皆是,追述着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文人雅士的诗赋唱和之作也被僧人羽流镌刻上石,供人吟哦。

碑刻文字是一种公开的地方历史档案,是区域历史文化的可靠见证,其记述的内容反映了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共同行为规范和文化价值观念,具有地方性和民间性,直接记述了历代普通人物的活动,因此,它是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史不可或缺的资料。碑刻资料还可以补史之阙,证史之误,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研究地方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随着时间的流逝,经过自然风化、战乱兵燹、地震灾害,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人为毁坏,宁武现存碑刻已十不存一。据村民讲,有的做了屋基,有的修了水渠,有的做了台阶,还有的被砸碎烧了石灰,只有少部分被埋入地下保存起来。全县现存碑刻除少数被文物部门较好地保存以外,相当一部分或矗立于乡间小庙,或倒卧于荒烟蔓草之中,或已散落民间被挪作它用,随时有佚失之虞,因此,抢修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成了当务之急。

这部书由三部分组成,上编为现存石刻,收录碑文 137 篇。中编为石雕,收录 60 条。其中有文字者 19 条,无文字者精选 31 条,附于其后。下编为佚失石刻,收录 41 篇。其中,按时代分,东魏 1,宋 1,金 1,元 1,明 39,清 137,中华民国 12,中华人民共和国 15。按内容分,有功德碑、墓表、墓志、重修、增建庙宇、寺观记事等,记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田亩、教育、宗氏家族、乡规民约、旅游记事等,可谓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所刻载的人物,上至朝廷命官、英雄豪杰、才子佳人,下至寒儒布衣、山野白丁、江湖隐客、市井小民、乡间老妪,涉及每一个社会阶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石刻碑文,是一部记载数千年宁武历史文化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宁武现存的这 166 篇石刻文字中,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有:《宁武关修学碑记》、《明世宗户部分司宁武敕》、《总镇高公鼎建宁武帅府厅堂记》、《山西镇坐营题名记》、《重修芦芽山碑记》、《重修龙泉寺千佛洞碑记》、《总兵周公墓表》、《周将军墓表》、《民山碑记》、《文昌帝君垂训阴鹭文》、《宁文堡(暮春)诗碑》、《重修广济寺碑记》、《谒周忠武墓记》、《新建忠武宫保周公祠墓志》、《望华楼记》、《周忠武公庙碑》、《鹤鸣书院记》、《周总戎守宁武关事略》、《修建汾源庙楼记》、《新建宁武府治碑记》、《重修清居禅寺禁伐山林木植碑》、《重修万佛洞碑记》、《治理粟店欺行霸市碑》、《重修宁武府城鼓楼记》、《重修清居禅寺好善乐施禁山碑记序》、《禁山碑记》、《抗日烈士墓碑记》、《汾源胜境铭记》、《重修宁武文庙记》,以及一些地方名人书写的碑铭、诗词等等。这些石刻在历史、科学以及书法艺术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其中《新置宁武关记》、《新设宁武兵备道题名记》、《明世宗户部分司宁武敕》、《总镇高公鼎建宁武帅府厅堂记》、《山西镇坐营题名记》等碑文,反映了宁武建关初期的活动。《总兵周公墓表》、《周将军墓表》、《谒周忠武墓记》、《新建忠武宫保周公祠墓志》、《周忠武公庙碑》、《周总戎守宁武关事略》等碑文,记述了李自成倒取宁武关,明三关总兵周遇吉为明尽节的过程。《宁武关修学碑记》、《鹤鸣书院记》、《重修宁武府城鼓楼记》,记述了边关将帅们在戎马倥偬中捐俸支持办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事迹。宁武府知府魏元枢写的《望华楼记》,知府周景柱写的《周忠武公庙碑记》,宁武县令施作揖写的《鹤鸣书院记》、五寨县令秦雄堡写的《周总戎守宁武关事略》、《芦芽山赋》,清末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徐松龛为汾河源头写的《修汾源庙楼记》等碑文,文字优美,意境高远。万佛洞门口两侧的石刻长联和石壁诗刻,为明代妙峰高僧的诗作,也是妙峰高僧的书作,长联和诗作均系双钩雕刻。洞门头“万佛洞”阴刻三字,为当时兵部尚书王崇古所题,现保存完好,俱为珍品。

总之,这些石刻集中反映了宁武的历史文化,值得我们研究与珍藏。

目 录

凡例

总序	李玉明
序	郭宝厚
概述	郭俊杰 连林杰

上编 现存石刻

●宋·金

汾源摩崖石刻记	(五)
昌宁公冢庙记	(七)

●明

重修螺蛳洞碑记	(一一)
重修芦芽山碑记	(一二)
龙泉寺洞中碑记	(一四)
芦芽山乾元寺元寿圣境赋碑记	(一五)
云居禅寺碑	(一六)
重修龙泉寺千佛洞碑记	(一八)
重修朝阳洞记	(二〇)
千佛洞皇图永固帝道遐昌碑记	(二二)
重建芦芽山起修说法台顶佛殿记	(二四)
奉令谕马头山清居禅寺送幡输经记	(二五)
重修清居禅寺碑记	(二六)
宁化万佛洞二碑诗记	(二七)
万佛洞石柱上碑记	(二九)

●清

重修万佛洞碑记	(三三)
总镇周公墓表	(三六)
重修北天寺龙王庙碑记	(三八)
清居禅寺除害重修碑记	(三九)
姜庄村民捐龙王庙碑记	(四〇)
葛家古墓墓名碑	(四一)
修忠武公墓记	(四二)
重修万佛寺碑记	(四三)
文昌帝君垂训阴鹭文	(四五)
谒周忠武墓	(四六)
吊周总兵	(四七)
重修八龙庙碑记	(四八)
重修龙神庙碑记	(四九)
城墙维修碑记	(五〇)

重修关圣帝君碑	(五二)
皇清待赠王老年兄暨元配王孺人合葬墓表序	(五三)
雷鸣寺碑记	(五四)
侯公墓志	(五五)
王老年世世相传墓碑记	(五六)
皇清待赠王孺人赵氏、洪氏墓表序	(五七)
流芳百代碑	(五八)
重修广济寺永垂碑	(六〇)
重修兴添寺碑记	(六一)
宁文堡《暮春》诗碑	(六二)
皇清恩赠介宾王老年台暨诸孺人墓表序	(六四)
王翁讳琬字映霞□魂合葬原配石孺人碑记	(六五)
贾鹏凌墓志铭	(六七)
重修广济寺功德碑记	(六八)
二马营西阁维修碑记	(七〇)
重修广济寺碑记	(七二)
皇清待赠王老年台暨孺人合葬墓表序	(七三)
皇清应授将仕郎王翁孺人合葬墓表序	(七四)
重修永济桥记	(七五)
忠武公墓碑	(七六)
皇清待赠县学优生王讳绪祖字殊先暨元配刘孺人墓志铭	(七七)
宁邑五桃王公墓石表	(七八)
皇清待赠修职佐郎效彭王老年台、敕旌节孝孺人王母刘老太君墓表	(七九)
邑庠生显考卓亿府君暨妣刘、王太君墓表序	(八〇)
皇清例赠武略佐骑尉希孔王公墓表序	(八一)
美唐王老年台墓石序	(八二)
皇清例赠修职佐郎明经进士怀庵王翁志铭	(八三)
清真庵铭碑	(八六)
重修雷鸣寺碑记	(八七)
继统王公墓表并志	(八八)
修建汾源庙楼记	(八九)
重修染峪洞庙碑记	(九〇)
雷家圣旨恩赐碑	(九一)
染峪龙泉洞寺光裕碑	(九二)
重修庙碑记	(九四)
二马营重修文昌阁记	(九七)
中山阁立住持碑记	(九九)
重修天花洞碑记	(一〇〇)
青龙山天花洞诗记	(一〇一)
重修兴添寺碑记	(一〇二)
重修河神观音阁碑记	(一〇四)
二马营重修玄天阁碑序	(一〇六)
太子殿石匾	(一〇九)
重修染峪洞佛殿洞梯禅房碑记	(一一一)
重建观音寺碑记	(一一三)
张家古墓神道碑	(一一六)
旌表节孝白母张太孺人墓表	(一一七)
新建圣母庙碑	(一一八)